

蘇聯的 中東 政策

畢英賢

中東是西亞細亞洲及東北非洲的總稱，位於歐、亞、非三洲相匯合之處。俄國歷代沙皇即不斷地向地中海、波斯灣、巴爾幹及阿富汗等地推進。在現代，中東的石油、人民和空間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適合蘇聯的「西方戰略」目標。蘇聯的西方戰略目標是：控制歐洲，這一目標的實現將使世界力量的對比對蘇聯有利、使美國處於孤立和易受攻擊的地位。從五十年代起，蘇聯領袖即將其中東政策作為征服歐洲的主要手段。他們認為，如果在地中海、北非及中東取得控制地位，他們就能够削弱歐洲，甚至無需直接侵略，只要使用恫嚇和威脅手段，如利用石油武器，就可達到目的。同時，蘇聯若能控制中東，一方面可以直接支援非洲的「革命」或「民族解放」運動，他方面則可逐漸把勢力伸入印度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比、葡在中東和非洲的勢力逐漸煙消雲散，蘇聯一直努力填補這個真空。雖然有時得手，有時處於下風，但是始終朝着這既定的目標前進。

一 中東的複雜對立情況

二十多年來，蘇聯一貫為執行這一政策而進行各種活動。在實踐中，不僅利用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的敵對情緒，也利用其他區域性爭端。蘇聯則在這些爭端中獲利。

任何一位阿拉伯領袖，無論他是多麼溫和，都不能不對以色列採取敵對態度。由於美國是以色列的支持者，於是蘇聯以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自居，向一些阿拉伯國家提供武器和政治支持，並向西方提出軍事恫嚇。這些做法旨在誘使阿拉伯人相信，蘇聯可以幫助他們像許多世紀以前趕走十字軍一樣，今天也可把以色列人趕出。在三次大規模的以阿戰爭（一九五六、一九六七與一九七三年）中，蘇聯皆支持阿拉伯人。同時，蘇聯還支持巴勒斯坦的游擊活動。

中東國家內部存在着的矛盾，擴大了蘇聯介入的機會。這些衝突因素可歸納為四類：內部革命，領土爭執、民族對立、意識形態互相仇視^①。「革命」是開發中國家常有的問題，即使一些中東產油國家也難避免。石油所導致的鉅額歲入，固然可促使社會進

註① 衣沙威 (Charles Issawi), 「石油、中東與世界」(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2), 第五〇頁。1

步，但也使舊有的社會結構趨於脆弱，因為人們往往無視於多數成就，而却凝視於某一項的失敗。當人民的不滿情緒一旦被野心軍人或政治家利用時，現存政權就有被推翻的可能。但一國君主或酋長被推翻未必能增進其穩定性，敘利亞與伊拉克即為實例。

中東地區的領土紛爭極為繁雜，其中很多由來已久，於最先英國統治期間祇是隱伏未發，而在英國撤退之後即紛紛出現，尤以波斯灣附近最為複雜。土耳其與敘利亞有邊界糾紛，以色列與鄰近阿拉伯國家的衝突在基本上也是領土爭執；最近，索馬利亞與依索比亞之戰亦係因領土問題而起。在中東有五大民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庫德人及以色列人。庫德人屢屢反對土耳其、伊拉克及伊朗政府；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經常發生邊界爭執，阿拉伯人與伊朗人一度因爭奪波斯灣霸權而相互成仇，伊朗首先與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相鬥，然後與伊拉克為敵；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更為顯著。在意識形態上，中東可分為「穩健」與「激進」兩類國家。穩健國家大部分是產油國家，諸如伊朗、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激進國家有埃及（現已轉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南葉門等。這兩大類國家間，對區域政治與國際關係往往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激進國家大部分傾向蘇聯。去年底，埃及對以色列態度轉變，而進行直接談判，就遭到激進國家及蘇聯的反對與攻擊。

蘇聯藉着擴大貿易、經濟援助、軍事支援與外交支持等，能在幾個主要的阿拉伯國家佔據優越地位，這些國家是阿爾及利亞、伊拉克、敘利亞、南葉門、埃及、蘇丹（後二者與蘇聯關係已惡化）。蘇聯另一些阿拉伯國家中的影響力也慢慢形成；甚至有已插足到伊朗與土耳其之跡象，這可能會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這兩個國家所長期享有的優越地位。此外，蘇聯在地中海與印度洋加強其海軍力量，毫無疑問地也會有助於蘇聯在中東的經營。

為瞭解蘇聯在中東活動的現況與傾向，本文擬分析下面幾個問題：蘇埃的決裂，蘇聯對以阿之爭的態度，蘇聯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敘利亞等之關係，以及其在「非洲之角」等地的活動。

二 蘇埃由友好到決裂

埃及處於亞、非兩洲的橋樑地位，控扼歐洲與印度洋的通道，因此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埃及在蘇聯的戰略天秤上即佔有極重要的地位^②。在納瑟（Gamal Abdel Nasser）當政時期，埃及成爲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蘇聯透過埃及把勢力伸入中東及非洲，支持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藉以反對以色列、反對穩健的保守的阿拉伯政權，反對西方。納瑟獲得了蘇聯的軍事裝備，經濟援助

註② 康貝爾（John C. Campbell），「蘇聯對非洲與中東政策」，*Current History*，一九七七年十月號，第103頁。

與政治支持；並容許蘇聯在埃及設置若干軍事設施。納瑟死後，沙達特繼任。他對蘇聯不甚信任，深知兩國利益不盡相同。但是，他仍於一九七一年與蘇聯簽訂了一項為期十五年的蘇埃友好合作條約。簽約次年，沙達特出人意料地要求蘇聯撤退其在埃及的軍事人員，並減少蘇聯海軍對埃及港口設施的使用。沙達特所提出的要求，不僅是對蘇聯未能提供所需武器的一項抗議，而且也是他鞏固國內地位、加強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關係的一種手段。

一九七三年，沙達特決定對以色列發動戰爭。雖然，在備戰期間與戰爭當中，蘇聯曾向埃及提供了軍備，但是戰爭的結果與美國的新外交政策却促使沙達特相信，埃及收復失土此一主要問題之解決只有仰賴美國。一九七四與七五年在季辛吉的斡旋下，埃及簽訂了兩個協議，以色列作出有限度的撤兵，這些進展皆係在美國一手主持下完成的。蘇聯雖然是一九七三年戰爭後調解以阿衝突的日內瓦會議之共同主席，然而在美國主動調解中，它只是一個旁觀者。在這段時間內，蘇埃關係繼續惡化，沙達特公開抱怨莫斯科未能充份供應埃及所需的軍備。蘇聯對此雖感厭惡，但還不想與其斷絕關係，希望能維持一定程度的聯繫，以待沙達特的親美戰略失敗後，再重拾舊歡。

一九七六年三月，沙達特宣佈廢除蘇埃友好條約，此後雙方關係日益惡化。一九七七年二月，開羅一家雜誌發表了沙達特攻擊蘇聯的回憶錄；蘇共機關報批評說，這個所謂回憶錄的內容完全以謊言、誹謗及捏造為基礎^③。其後，沙達特與蘇丹總統尼米瑞共同表示，蘇聯企圖利用利比亞及衣索匹包圍他們的國家。蘇聯則反控埃及準備攻擊利比亞，於是雙方關係又進一步惡化。

一九七七年六月埃及外長法米（I. Fahmy）訪問莫斯科，顯示雙方有意改善關係。結果成效不大，蘇埃間的主要問題——蘇聯繼續供應埃及軍火及償還蘇聯債務問題——均未獲解決^④。據說，蘇聯認為這些問題應在高峯會議上解決，因此在「共同聲明」中，埃及雖然邀請蘇共領袖訪埃，但日期未定^⑤。同月底，沙達特嚴詞指責埃及共產黨員是「蘇聯的僕從」，自此而後，蘇埃和解遂告冷卻。一九七七年底，沙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比金從事直接談判以謀求中東和平，蘇聯在短時間沉默後終於發出反對的言論，謂沙、比兩人圖謀破壞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努力，所以應該負起使中東情勢變為更複雜化的嚴重責任。蘇聯同時並指責，以色列試圖拖延談判、分化阿拉伯世界、不肯放棄侵略所得的領土；蘇聯認為埃及已放棄了「真正的阿拉伯事業」^⑥。蘇聯希望沙、比間的談判失敗，重返日內瓦，這將容許蘇聯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有較大的影響力。

註③ 「沙達特的『回憶錄』是對蘇埃友好的一記打擊」，「真理報」，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第四頁。

註④ 古利（John K. Cooley），「蘇、埃採取謹慎行動以改善關係」，「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六頁。

註⑤ 「消息報」，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第四頁。

註⑥ 「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 蘇聯對以阿之爭的態度

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在解決以阿衝突上仍扮演主要的角色。蘇聯未能參與美國所主持的調解活動，因此採取了若干措施以保護其在中東的利益，主要有二：一是宣佈蘇聯對中東問題的關切，表明其無意在中東競爭場上棄權；一是力圖加強其在參與以阿衝突之各阿拉伯國家內的地位。

去年三月，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親自宣佈蘇聯對以阿問題的立場。他首先指出，蘇聯是日內瓦會議的共同主席，同時蘇聯國土也與中東直接相連，因此對解決以阿問題的主要原則與方向，有它自己的意見。蘇聯認為，恢復日內瓦會議才是切合實際的做法，而擬定中東和平的詳細條件一事，應是所有介入衝突各國的共同事務。按照蘇聯的說法，應當在未來的「中東和平文件」中規定：不得以戰爭為手段而獲取領土之原則，中東地區各國的獨立生存與安全權利，賦予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以自決與建立自己國家之權利等。關於以色列應從一九六七年所佔領的土地上撤退問題，蘇聯則建議以軍應分期全部撤離佔領區。此外，蘇俄還認為以色列與各阿拉伯國家間的界線必須劃分清楚，確定後的界線將是永久性的，不可侵犯的^⑦。

布里茲涅夫又說，當以色列完成撤軍之際，就是戰爭結束，和平關係建立之時，各方面皆有義務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政治獨立，互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在爭執的兩國邊界上應該各設非軍事區，於一定期間內由聯合國派遣緊急武裝部隊或觀察員駐紮在該地區內。地區內的水道，包括蘇彝士運河、阿卡巴灣、蒂蘭海峽等，則於停戰後對一切國家（包括以色列）開放。為確保和平調解之條件得以實現，且經協議各方面同意，可由聯合國安理會或個別大國，諸如蘇聯、美國、法國及英國，保證條約之實施；担任保證之國家可以派遣觀察員，加入聯合國在中東各地區之工作人員的名額內^⑧。

布里茲涅夫所提的有關中東和平問題之原則，在本質上毫無新奇之處，但是由他本人親自提出，其意義一方面是在重新肯定蘇聯的立場，一方面則在提醒美國，表示蘇聯不容許美國在中東獨享霸權，但願在平等基礎上合作。一九七七年三月底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莫斯科，結果美蘇雙方同意，彼此以作為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共同主席之身份，共同合作以獲得該一地區之公正與永久和平，乃是極為重要之事^⑨。五月，葛羅米柯與范錫於日內瓦商討兩國在中東和平上的合作問題，十月初蘇美發表關於中東問題聲明，並決定十二月底以前恢復日內瓦會議。這些事實表明，美國不反對與蘇聯共同努力以尋求中東和平，只是兩者在如何解決中東問題上存有基本歧見，例如，邊界問題與巴勒斯坦問題就是。

註⑦ 布里茲涅夫，「蘇聯職工會是我們社會的影響力量」，「消息報」，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三頁。

註⑧ 同前註。

註⑨ 「布里茲涅夫和葛羅米柯，與范錫談判的結果」，「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第一頁。

蘇聯認為，以埃雙邊會晤之前，中東情況正朝着積極方面發展，以埃直接會議後才致使該地區業已複雜的情勢更加複雜起來，進而導致了阿拉伯國家的分裂^⑩。顯然，由於這一事件促使日內瓦會議的召開無限延期，自然會令蘇聯不滿。蘇聯堅持，有關中東問題的一切最後決定必須在日內瓦會議桌上通過，也必須獲得全體與會者的贊同，但是以埃直接談判的企圖，則是想以「單獨交易」來代替「全面解決」^⑪。蘇聯指責以色列說，目前，它顯然企圖拖延談判，爭取時日，藉其友邦之助迫使開羅就範，先與埃及簽成個別條約，進而使用同樣方法施之於其他阿拉伯國家^⑫。以埃會談之所以引起蘇聯不滿，因為它使蘇聯為恢復召開日內瓦和會所作的種種努力告吹，而蘇聯正企圖藉這個會議加強其中東的地位。更何況，在以埃會談中，蘇聯完全被擋在門外，毫無置喙餘地。

四 蘇聯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係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下簡稱巴解組織）於一九六四年成立時，蘇聯並無特殊反應，仍舊視巴勒斯坦問題為難民問題，該組織當時的領袖蘇凱利（Ahmad Shukeiry）說，投靠蘇聯之路已被堵住。於是，巴解組織唯有投靠中共，而中共的反應却積極而具體^⑬。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戰爭」後，於一九六八年中，蘇聯立場才有所改變，這種轉變起初係受了中共對巴解組織的援助與重視之影響。其後，巴解組織在中東漸受注視，且埃及已與巴解組織建立關係並加強合作，而埃及當時是蘇聯中東政策的基石。這些事實加速了蘇聯態度的轉變。一九六八年七月，埃及總統納瑟帶着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訪問莫斯科。從此，在蘇聯的報刊上經常提及「巴勒斯坦游擊隊」、「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特別是「阿爾·發塔」（Al Fatah）等名稱。蘇聯稱頌其活動，誇耀其成就，並開始間接供給武器裝備。雖然如此，蘇聯仍然將巴解組織視為難民問題，在論及中東衝突時，蘇聯只提及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兩方面，而不提巴勒斯坦人。

一九七〇年二月，阿拉法特自率代表團訪蘇；此次訪問再度使蘇聯對巴解組織的態度轉變，蘇共機關報創造了一個新名詞「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⑭，這顯示蘇聯開始承認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民族問題。但是，巴解組織與蘇俄雙方關係並無重大的改善。當時莫斯科所關切的，並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處境，而是蘇聯與敘利亞的關係，以及蘇美關係。到了一九七二年七月阿拉法特訪蘇後，蘇聯與巴解組織的關係再度獲得進展，蘇聯開始直接以武器供給巴解組織。這次關係改善的原因是，當時蘇埃關係業已惡化，蘇聯顯然企圖組織一個包容敘利亞、伊拉克及巴解組織的「進步陣線」。不過，蘇聯對巴解組織發生強烈興趣的時期，乃始於一九七

註⑩ 丁姆欽柯（P. Demchenko），「公正和平，而不是個別交易」，「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四頁。

註⑪ 阿羅夫（O. Alov），「中東：解決問題的實際之途」，「國際生活」，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第八十五頁。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戈蘭（Galia Golan），「蘇聯與巴解組織」（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九七六），第一頁。

註⑭ 「真理報」，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三年的「十月戰爭」。

一般來說，自一九六八年開始，蘇聯與巴解組織的關係雖然不斷改善，但是兩者之間仍有一些基本差異，最重要的是：(一)巴勒斯坦立國問題，包括有關邊界問題及以色列存續問題；(二)中東調解問題，包括聯合國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及日內瓦會議問題；(三)對恐怖手段的使用問題；(四)巴解組織內部的團結問題；以及(五)承認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代表問題等等^⑤。

蘇聯認為巴勒斯坦立國應以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為限，巴勒斯坦人則欲消滅以色列。因此，在調解中東問題上，蘇聯堅持以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為基礎，巴解組織則極力反對，因為該決議案承認以色列是一個國家。蘇聯反對巴解組織使用恐怖手段，因為蘇共認為，恐怖手段祇有反效果，對阿拉伯世界有害無益。此外，巴解組織內部缺乏團結，成為蘇聯經常批評巴解組織的主題，這也是蘇聯不願放手援助巴解組織的一個原因；巴解組織不以蘇共之批評為然，它辯護說，不同意見的表達是革命組織內部健全的一個表徵。在蘇聯與巴解組織的關係中，最大的問題是，蘇聯至今尚未承認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今年三月上旬，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又訪問莫斯科，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蘇聯對巴解組織的關係未有重大改進。蘇聯邀其訪問的目的在促進反沙達特（即反西方）勢力的「團結與合作」。布里茲涅夫在提到巴解組織時仍把它列為「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導隊伍之一」^⑥，而不是巴解組織所期望的「唯一的合法代表」。在蘇聯主張重開日內瓦和平會議之同時，它希望巴解組織也能够參加。但是，美國顧慮到以色列的立場，認為很難把巴解組織視為一個公認的、獨立的實體，只宜於當日內瓦和平會議初步日程確定後再准巴解組織參加。蘇聯官員則表示，關於巴解組織參加未來日內瓦會議的問題，應由阿拉伯國家決定^⑦。

五 蘇聯與敘利亞的關係

在第三次（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前，蘇聯對中東政策的重點在開羅；其後，蘇埃關係開始決裂，莫斯科才把重點放在大馬士革。在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之前，敘利亞早已成為典型的蘇聯的受援國。敘利亞在意識形態與實際政治方面，均趨於急進並標榜社會主義，它依賴蘇聯的軍事供應，並接受蘇聯的建議與指導，而敵視西方。不過，自一九七一年阿塞德（Hafez al-Assad）當權後，敘利亞已有較多的獨立性，例如，他拒絕同莫斯科簽訂類似於一九七一年蘇聯與埃及、以及一九七二年蘇聯與伊拉克所訂的友好合作條約，但是仍需仰賴蘇聯的保護與支持。

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蘇聯的支援固然有助於敘利亞的防衛，但這次戰爭也使敘利亞醒悟，蘇聯的武器無法有效地阻止以色列

註⑤ 同註③，第二頁。

註⑥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第一頁。

註⑦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第五頁。

的進攻，蘇聯的外交也無法幫助敘利亞收復失土。於是，阿塞德接受季辛吉的調解，與美國恢復了外交關係，並與以色列於一九七四年五月簽訂臨時協議。阿塞德的作風和沙達特不同，他仍然與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

一九七五年開始的、持續一年半有餘的黎巴嫩內戰，變成了蘇敘關係發展中的不利因素。這使大馬士革一度與巴解組織相互衝突，給予以色列喘息並乘機干涉黎巴嫩的機會，最後使蘇聯與敘利亞發生了嚴重的歧見。起初，敘利亞支持左派及巴解組織，而反對基督教勢力；最後則一反其立場，而以軍隊對付巴解組織。探討敘利亞改變政策的原因，計有：大馬士革視黎巴嫩為敘利亞一部分的歷史觀點、擔心革命政權與伊拉克相聯合、巴解組織必須予以控制等。蘇聯對於敘利亞的此種干涉行為，大表不滿，在一九七六年六、七兩月間蘇聯曾公開批評敘利亞的干涉為有害無益，並在宣傳上毫不含糊地支持巴勒斯坦左派以武力攻擊的當時接受敘利亞援助的基督徒。雖然如此，蘇共領導人却不敢給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以具體的援助。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與以色列的海軍在黎國南部海岸附近出現，另一方面則深恐與敘利亞決裂將會迫使它投靠美國。

一九七七年四月，阿塞德應邀訪問莫斯科，以圖彌補兩國關係的裂痕。此時，黎巴嫩南部已比較平靜；蘇聯領袖也已了解，大馬士革並無意消滅巴解組織，因此決心修好，否則蘇聯在以阿衝突中將失去外交活動的餘地。結果，敘利亞承諾，支持蘇聯為籌開日內瓦會議所進行的外交努力^⑮。這一點對蘇聯具有重大意義，因為美國卡特政府無意讓蘇聯在日內瓦會議重開之前就參與中東問題的談判。蘇聯則應允在以阿談判中支持敘利亞，恢復供應在黎巴嫩戰爭中所停止的武器援助，並擴大貿易與增加技術及經濟援助。但蘇敘修好，並不表示這兩國歧見已消，而只是基是現實利益的一種妥協而已。

對於以埃直接談判，蘇敘兩國同表反對。今年二月底，阿塞德再度訪蘇，雙方關係進一步加強；在黨政、軍事、經濟、文化及科技諸領域之合作皆有改善。尤其是在軍事方面，蘇聯不斷協助「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提高其國防水平^⑯。阿塞德返國後不久，敘利亞派出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訪蘇，進一步商討增加敘利亞國防力量的細節。顯然，日下的蘇敘關係又有了重大的改善。

當前述之蘇敘關係一度趨向惡化時，蘇聯曾試圖將中東政策的重點轉向伊拉克與利比亞。後來，由於蘇敘兩國關係好轉，於是這一轉向便未成事實。不過，縱然蘇聯可以信賴伊拉克與利比亞現今的政治領導人——他們被蘇聯稱譽為含有「革命」與「進步」的性格，然而欲使伊拉克或利比亞成為蘇聯中東政策的基礎，則在各方面皆有相當困難。尤其是在一九七五年庫德人民民族主義失敗後，伊拉克對蘇聯的依賴程度已大為降低。但是，在蘇聯的中東政策中，伊拉克却另有用場。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倫敦「時事」周刊透露，蘇聯與伊拉克於當年八月十七日曾簽訂了一項祕密協定。根據該協定，蘇聯向伊拉克提供大批軍備，包括七艘載有導彈的護航艦、六艘潛水艇和一些載有導彈的快速砲艇^⑰。蘇聯的目的在使伊拉克成為波斯灣的另一個軍事強國，同時則使伊朗不再是波

註⑮ 「蘇敘聯合公報」，「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一、四頁。

註⑯ 「蘇敘聯合公報」，「消息報」，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一、二頁。

註⑰ 另見美聯社貝魯特電，「中國新聞」(英文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三頁。

斯灣的首要軍事強國。伊朗是中東地區唯一不是阿拉伯國家的產油國。爲了防止蘇聯的侵襲，伊朗經常購買美國和西方的武器，擴充軍事力量，遂成爲波斯灣的首強，且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因此，蘇聯一方面使伊拉克成爲波斯灣的軍事強國以與伊朗匹敵，另一方面則設法打亂伊朗與美國的關係，以使乘機插手波斯灣。據統計，西歐及日本的石油進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係來自波斯灣，如果蘇聯勢力一旦介入該區，那麼西歐與日本的經濟必將遭受新的威脅。

六 蘇聯在「非洲之角」的活動

「非洲之角」是蘇聯在中東銳意經營的另一地區。「非洲之角」地處紅海、亞丁灣及印度洋的匯合處，也是阿拉伯非洲與黑色非洲的分界線，極富戰略意義。蘇聯在這一地區的經營目標是建立海軍及空軍設施，並擴張其政治勢力。蘇俄在七十年代初期，已與紅海及亞丁灣附近之若干國家，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其中有埃及、蘇丹、北葉門、南葉門及索馬利亞。南葉門的亞丁港與索馬利亞的柏貝拉港對蘇聯尤其重要性，蘇聯在柏貝拉港設置有導彈控制綜合體。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於「非洲之角」同美國維持密切關係的國家，只有衣索匹亞；而其他阿拉伯國家則在蘇聯的慫恿下，支持伊里垂亞省(Eritrea)的叛亂，使衣索匹亞束手無策。

至一九七六年中，形勢遽變。埃及驅逐了蘇聯軍事顧問，廢止了蘇埃合作條約；蘇丹總統尼米瑞指責蘇聯兩度企圖推翻其政權，因而斷絕軍事關係並轉向美國與中共。此外，北葉門也逐漸脫離了蘇聯的影響力而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較密切的關係。沙烏地阿拉伯又利用石油與金元促使阿拉伯國家團結，促使南葉門與索馬利亞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一九七六年三月，沙烏地阿拉伯終於與南葉門建立了外交關係。亞丁政權雖然不致於改變其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或與莫斯科斷絕往來，但是蘇聯在南葉門的影響力已逐漸減弱。同樣，沙烏地阿拉伯的金元外交也使蘇聯與索馬利亞兩國產生了隔閡。

爲了抵銷前述現象，蘇聯首先加強與利比亞的關係，然後竭力拉攏衣索匹亞。蘇聯與利比亞之間雖然存有基本的歧見，例如在以阿衝突上，利比亞一貫反對蘇聯的調解方案，但是雙方都有意改善相互關係。在利比亞，由於其與埃及關係的惡化，以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不和而陷於孤立，亟需一個大國作後盾。在蘇聯，則欲借用與利比亞的關係向華盛頓與開羅表明，蘇聯在阿拉伯世界尚其他的立足點。

不過，在衣索匹亞問題上，蘇聯却遇到了難題。在一九七四年塞拉西國王政權被推翻前，衣索匹亞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左翼軍事執政團執政後，與美國關係開始冷淡。一九七七年二月，當以孟基杜(Mariam Mengistu)爲首的，自命爲「馬列主義者」的一批軍人取得政權後更與美國交惡。孟基杜下令美國的軍事代表限期離境；他接收了蘇聯的軍備，並親赴蘇聯，簽署共同友好聲明

②。由於索馬利亞與衣索匹亞本為世仇，蘇聯拉攏衣索匹亞就不得不影響到蘇聯與索馬利亞間的關係，而索馬利亞在蘇聯的中東政第上又正佔有重要地位。蘇聯居然不願觸怒索馬利亞而願與衣索匹亞進行友好，際其原因可能是：(一)孟基杜自稱是「馬列主義者」領袖，使蘇聯難以拒絕；(二)索馬利亞在軍事與經濟上均極端依賴蘇聯，同時衣索匹亞與蘇聯的關係已欲罷不能，蘇聯原想藉此形勢迫使雙方和解，(三)即使和解不成而失去索馬利亞，但衣索匹亞獲得蘇聯武器後也可成爲蘇聯在中東及非洲地區的主要基地，而取代索馬利亞。

結果，索馬利亞不僅拒絕妥協，且於一九七七年七月向衣索匹亞的奧加登(Ogaden)地區發起全面攻擊，衣索匹亞向蘇聯求取政治與軍事援助。索馬利亞總統巴雷(Siad Barre)也於八月訪蘇，企圖獲得重武器，在被蘇聯拒絕後，即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援助。十一月，索馬利亞片面廢除索蘇友好條約，並令一切蘇聯專家撤離索馬利亞。蘇聯於是大力支援衣索匹亞，並派遣古巴軍隊協助衣國作戰。由於美國未能積極援助索馬利亞，終使衣索匹亞在奧加登獲得勝利，於是蘇聯在衣國的影響力也因之增加。

七 結論

中東因其戰略地區及石油資源的重要性，早已引起蘇聯的覬覦。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蘇聯就開始向這一地區滲透。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影響力逐步增大。迨一九七三年後，始漸遭頓挫。在季辛吉的「穿梭外交」下，蘇聯幾乎被冷落一旁，毫無插手餘地。及至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先是索馬利亞廢除索蘇友好條約，然後埃及總統沙達特赴耶路撒冷，遂啓開了埃及直接談判的序幕。

蘇聯爲了維護其在中東的地位，於是開始積極行動，而且局部調整其在中東的戰略。首先，它乘機拉攏諸如敘利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以及巴解組織等的反沙達特集團，同時，並加強籠絡南葉門及伊拉克。一九七八年初，阿爾及利亞總統、利比亞前總理、南葉門總理、敘利亞總統、巴解組織首領等已一一應邀訪蘇。透過和他們的交談中，莫斯科領袖批評埃及總統的「投降政策」、「對阿拉伯世界團結的破壞」，強調「進步的阿拉伯勢力必須團結起來以謀取中東問題的全面解決」；蘇聯答應，將給予他們一切的援助。

在做法上，蘇聯似乎已經洞悉，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對重返日內瓦和平談判興趣不高，因此在蘇聯的言論中已不如往昔特別強調此點。在另一方面，蘇聯正試圖組織一個新的反沙達特集團，這不是以「反以色列」而是以「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美國)爲基礎。三月上旬，巴解組織的恐怖突擊，殺死了三十多名以色列人，以色列政府因此攻佔了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基地，頓使原已陷入僵局的以埃談判更加複雜，也因此給予蘇聯可乘之機。對蘇聯而言，中東局勢是愈亂愈好。

就中東局勢總趨向來看：(一)以阿衝突一時難以解決；(二)美國對以色列之支持一時不會終止；(三)反以色列的激進國家勢必依賴蘇聯的軍事與外交支援。因此，蘇聯在中東仍有發展其影響力的機會。欲遏制這一傾向，西方國家(包括以色列)需要支持溫和和阿拉伯國家的立場，以期在以阿問題上早日謀求合理的解決。